****

2022第四期

（总第237期）

#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党中央举办这次专题研讨班，目的是深入研读和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关于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我在很多场合已经提了要求。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讲了党中央对全会议题的考虑，强调制定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必要性、重要性和需要把握的重点问题。在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我强调要以学习全会精神为重点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历史自信、自觉坚守理想信念，坚持党的政治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坚定担当责任、不断增强进行伟大斗争的意志和本领，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举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我强调开展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就是为了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特别强调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做到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实际、带头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

这次办的是专题研讨班，既然是研讨，我想在同大家一起研读全会决议的基础上，重点讲5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了全面总结，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强调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强调进入新时代党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全会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时强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重分析研究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的灵魂和旗帜。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科技文化十分落后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等等。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常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杀出一条血路也是要有理论指引的。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我们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新时代强军目标和战略，提出维护和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全面管治权，提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提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等等，都是从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出发，经过审时度势、科学判断、深入思考提出来的，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全会决议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永无止境。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我们要实事求是分析变和不变，与时俱进审视我们的理论，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创新，决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我们常说现在领导干部有个“本领恐慌”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本领不足是理论素养不够。毫无疑问，我们要坚持党的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同时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理论论点也不可能一成不变，由其产生的具体方针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比如，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党就要以此来思考、谋划、推进发展工作，不要偏离，不要动摇。

总之，时代在发展，事业在前进，我们不能简单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所说的话来套今天的中国实际，也不能简单拿党过去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和由此产生的具体政策举措来套今天的工作。什么事情都要看一百多年前是怎么说的、几十年前是怎么说的，不能越雷池一步，只能亦步亦趋，那还怎么前进？！那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个问题：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

古人说：“善为理者，举其纲，疏其网。”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这次全会决议，对党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作了全面分析，强调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强调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强调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有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大革命时期，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确立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中心任务，领导人民兴起了大革命的洪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及时调整中心任务，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抗日战争爆发后，党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中心任务，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党认识到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并在这个中心任务指导下夺取了解放战争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党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变化，不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科学分析，党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党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新特点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虽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但却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重点抓住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新的特点。党深刻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科学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从各方面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面对复杂形势、复杂矛盾、繁重任务，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特别是如果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就会对党和国家事业产生严重危害，甚至是颠覆性的危害。比如，当年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第三个问题：重视战略策略问题**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一百年来，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战略策略问题、不断提出科学的战略策略作了全面总结，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明确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推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战略策略，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强调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领导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强调进入新时代党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提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战略。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战略策略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毛泽东同志很形象地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同志讲的这种领导，就是战略领导。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这场战争能不能胜利？怎样争取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国土小人口少我国土大人口多、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准确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的三个阶段，系统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依靠力量和战略战术，使全国人民对抗战的进程和前途有了清晰的认识，极大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讨论抗战胜利后党的发展前途时，毛泽东同志就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抗战胜利后，我们党迅速调集2万干部和11万军队抢占东北，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共77人，其中派往东北工作的就达20人。这是多么富有远见的战略决断！后来的发展也证明这个战略决断对解放战争胜利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绝不能犯战略性错误。小的方面有看不到的，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样的失误牵涉的是一点一事的问题，影响面不大，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如果在战略上出现了偏差，那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付出的代价将会很大。党在早期有过惨痛的教训。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在战略上判断错了，看不到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性，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付出了极大代价。所以，我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

古人说：“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仓卒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成也。”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要取得各方面斗争的胜利，我们不仅要有战略谋划，有坚定斗志，还要有策略、有智慧、有方法。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站位要高，做事要实，既要把方向、抓大事、谋长远，又要抓准抓好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既要算大账总账，又要算小账细账。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就容易出现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问题，就会错失发展机遇。

解放战争后期，党领导进行土地改革，这是一个争取广大农民支持的战略举措，但怎样把它落到实践中执行，需要采取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土地改革工作开始有些乱，一些地方有些“左”，后来及时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第二种是日本投降至1947年8月大反攻前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第三种是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因群众尚未发动，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正是实行了有区别的正确的策略，整个土地改革进行得很顺利，无论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党都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真诚拥护和支持。

各地区各部门确定工作思路、工作部署、政策措施，要自觉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必须无条件执行，确保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党中央战略决策时应该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制定策略，这是必须的。同时也要注意，大家提出的各种策略，有的可能是符合中央战略的，有的则可能是偏离中央战略的。这就要注意及时总结评估，偏离了的要赶紧调整。

**第四个问题：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管党治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作了全面总结，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坚持“两个务必”，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强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着力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强调进入新时代党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如此等等。六中全会决议概括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第五条就是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第十条就是坚持自我革命，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自我革命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在去年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我再次讲了这个问题，强调党的高级干部有相当的领导权、决策权、指挥权，如果立场不稳、“三观”不正、自律不严，很容易在政治上、政策上走偏，不知不觉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代言人，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自我革命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廉洁自律、反腐倡廉问题是我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原因就是腐败问题远未根绝。现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党内仍然存在搞“七个有之”、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贿赂、欺压百姓等问题。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这里，我再用重槌敲一下响鼓！党中央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不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决不饶恕！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

**第五个问题：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注重进行党史学习教育作了全面总结，强调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继续抓好落实。

对六中全会决议，不要觉得一看就懂，其实不然。关于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前两个历史决议、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都有过大量论述，都郑重作过结论，这次全会决议坚持这些基本论述和结论。同时，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新认识。决议注重运用党史基本著作成果和党史界学术研究成熟成果，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论断新表述。比如，完善了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分期的表述，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四个阶段界定为“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而第二个历史决议表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比如，明确将“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标志为“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比如，结合遵义会议具体组织安排和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增写了“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拓展了遵义会议重大意义的概括和总结。比如，贯通“14年抗战”回顾和总结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修改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抗日战争“八年之久”的说法，将抗日战争起点确定为1931年，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全面回顾和总结党领导的14年抗战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意义。比如，首次在历史决议中写入“在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的观点。比如，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八个明确”拓展为“十个明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列为第一个“明确”；增加了第七个“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内容；第十个“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此外，第二个“明确”，增加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第三个“明确”增加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表述。对这些新论断新表述，要深入学习领会，以利于更好认识和把握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我历来重视党史的学习教育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先后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等座谈会和大会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大会上发表讲话，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宣传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9年，我着眼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件大事，提前就加强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进行思考和谋划，强调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心、勇担使命。2020年，我就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统筹起来进行考虑，多次提出要求。2021年2月，我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讲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主要讲了为什么学习党史、党史学什么、怎样学党史的问题。之后，我又多次对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提出了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到地方考察70余次，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瞻仰对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有的是专程去瞻仰革命旧址和纪念场所，主要的基本上都走到了。每到一地，我都是怀着崇敬之心，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党一路走过的艰难历程，灵魂都受到一次震撼，精神都受到一次洗礼。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党全国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习党史、铭记党史，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真正坚定历史自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这样做，就一定能收到明显成效。

推动全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靠一次集中学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况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年轻干部的党史学习培训要不断进行下去。这次进行党史学习教育总结时，我专门作了批示，强调要认真总结这次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全党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把全党武装起来，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实下去。要原原本本学习全会决议，学懂弄通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学懂弄通党坚守初心使命的执着奋斗，学懂弄通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学懂弄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要用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推动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带头学党史、经常学党史。要用好干部教育培训机制，继续把党史作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必修课、常修课。要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渠道，推动党的历史更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好党史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用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形成的良好机制，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满腔热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习近平在浙江（十三）**

# —**“‘八八战略’与‘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是习书记主政浙江的总抓手和总要求”**

采访对象：潘家玮，1958年12月生，浙江松阳人。曾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现任杭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政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7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潘主席，您好！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思想和方略。您时任省委政研室主任，对这些思想和方略的形成过程一定很了解。请您先谈谈对习近平同志提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认识。

　　潘家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是习书记在浙江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提出的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总要求。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GDP只有123.7亿元，之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2002年达到8003.7亿元。习书记在浙江工作那段时间，浙江经济正好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遭遇了资源要素、生态环境的双重制约，我们把这种情况叫作“成长中的烦恼”。首先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期。当时浙江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三高三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产品档次低、销售价格低、市场低端。原来的先发优势在减弱，急需进行转型。其次是社会结构转型期。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大量农民进城，城乡二元结构被冲破了，还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再次是社会矛盾凸显期。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化和日趋复杂，社会矛盾逐步积累，开始发生一些群体性事件。最后是自然灾害频发期。2004、2005年台风灾害频发，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总的来看，浙江改革开放起步早，经济社会发展中许多矛盾和问题先发早发，改革进入攻坚期，如何引领浙江这辆改革快车继续行稳致远，是习书记主政浙江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新形势新要求对习书记确实是严峻的考验，但他非常冷静沉着，牢牢把握大局，主动应对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他刚到浙江时在一次会议上讲道：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但我有决心和信心把这一棒接好。2003年，习书记围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亲自开展了深化改革专题调研，全面深入系统地分析浙江改革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要在宏观层面特别是政府层面进行改革；二是从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推进，包括社会与政治领域；三是对外开放要不断扩大，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与其他国家交往势必更多更广，这要求我们必须秉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谋划浙江的发展；四是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走在前列”是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书记向胡锦涛总书记汇报工作时，胡锦涛总书记对浙江提出的要求，内容主要是“1+3”：“1”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3”是三个具体要求，分别是落实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习书记根据胡锦涛总书记“走在前列”的要求，提出“干在实处”的工作方法，明确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走在前列”是目标，“干在实处”是方法，是工作态度。

　　2005年4月29日，习书记在省委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学习会上，明确提出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并且对如何“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作出了具体全面的部署，这是习书记当时最真实、最直接也是最科学的想法。他讲到，一是要历史地认识“走在前列”的要求，二是要辩证地理解“走在前列”的要求，三是要全面把握“走在前列”的要求，切实把“走在前列”的要求体现到精神状态上，贯彻到衡量标准上，落实到各项工作上。他最后讲到，“走在前列”最终要体现在真正干出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事，真正建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树立一流的目标，追求一流的水平，创造一流的效益，干出一流的业绩。这次会议之后，“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成为浙江发展的总要求，成为各级干部的自觉行动，全面贯彻落实到浙江各项具体工作中。

　　在这个总要求的指引下，浙江经济社会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从2003年到2006年，GDP年均增长14.0%，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采访组：2015年5月，习近平同志回到浙江调研时又再次提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潘家玮：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调研，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进一步深化为“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他还提出了“两个更”，一是在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水平上更进一步，二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快一步，继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成功举办，习近平总书记在峰会结束后，专门与浙江省委班子和杭州市委班子见了面。习近平总书记对峰会的成功举办感到很高兴，同时提出：“要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他对浙江寄予的这份厚望，对浙江的广大干部群众是莫大的鼓舞。

　　采访组：请您谈谈对习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战略”的认识。

　　潘家玮：习书记来浙江工作后，怎样在更高水平上谋划浙江发展的战略布局，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八八战略”的提出有一个过程，之后又有一个在贯彻落实中深化丰富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于习书记在浙江工作的全部实践。

　　“八八战略”是从调查研究开局的。2003年2月10日，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习书记特别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讲到事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七个方面内容，一是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二是关于建设经济强省、打造文化大省、推进依法治省，三是关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四是关于“北接上海、东引台资”，五是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六是关于维护社会稳定，七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在这些方面要通过调查研究来深化认识。第二天，他主持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以狠抓调查研究为突破口，促进各项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习书记布置了一批调查研究题目，他亲自带头，省领导都分工去做。

　　2003年6月18日，在全省“深化十六大精神主题教育，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电视电话会议上，习书记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八八战略”的内容，会后从省委班子到各地反响都非常好。7月10日到11日，习书记就在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八八战略”，与之前提出的略有调整，因此我们一般就认定这一次为正式提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天的会议上，习书记围绕发挥八个方面优势和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结合大量调研的实际，脱稿展开讲了很多“插话”，原先准备的讲话稿，这一部分只有3000多字，可他脱稿讲了9000多字，整整多了三倍。这不仅体现了习书记的智慧结晶，而且充分显示出“八八战略”完全是习书记根据浙江实际制定的科学战略。

　　说到“八八战略”这个名称，其来源也很有趣。当时习书记提出的是“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结果基层的干部们在工作中将其简称为“八八战略”，最后因为这个叫法简洁明了、朗朗上口，全省一致都叫“八八战略”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八八战略”在浙江基层的认可程度和实践深度。

　　可以说，习书记在浙江主政时，站在更高层次上全面系统谋划了浙江发展的战略布局，其中“八八战略”是总抓手，“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是总要求，这两者与其他几个重大决策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充分体现了习书记在省域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治国理政系列重要思想的初步探索和前奏曲。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主政时，作了许多方面的改革探索，请您举几个例子。

　　潘家玮：习书记在浙江非常重视改革创新，有几项改革力度比较大，成效也很好。

　　一是国有企业改革。原来大家都以为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得好，国有企业相对比较薄弱。实际情况是，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大环境中，浙江的国有企业也在很好地发展壮大，也走在了全国前列。2004年上半年，习书记亲自带调研组深入省属国有企业和杭州部分国有企业调研，启动了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省属国有企业改革。他明确提出，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中搞活国有经济，积极探索国有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国有企业可以让民营企业参股，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要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有人主张把西湖边一些国有宾馆卖掉。习书记非常明确地表示，西湖边上的宾馆属于稀缺资源，卖掉就买不回来了，类似这种情况的国有企业不能退出。当时他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思路，现在来看是完全正确的。

　　二是民营企业改革。当时民营经济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财政税收上都已经是浙江的支柱，民营企业下一步怎么发展，成为浙江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问题。当时民营经济还叫非公有制经济或个体私营经济，习书记专门让我们研究是否应该正式提出“民营经济”这个名称。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在2004年2月3日首次召开的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书记提出，民营经济要通过“五个转变”实现“五个提高”，具体来说就是：从主要依靠先发性的机制优势，向主要依靠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从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向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从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向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外向发展水平；从现有的块状经济、小规模经营，逐步向更高层次的集群化、规模经营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集约化和规模化水平；从比较粗放的经营方式，向更加注重信用、质量、生态和遵纪守法的经营方式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习书记的讲话，为浙江民营企业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理清了思路，有力推动了民营经济的转型发展。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浙江正式提出了“民营经济”的概念。民营企业家深切感受到习书记对他们的尊重、关怀与支持，努力按照新的要求推进转型升级。

　　三是“两山论”的提出。“两山论”的提出是很有针对性的，当时很多人为了追求发展，认为环境污染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习书记说，他的理解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取金山银山，就是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第二个阶段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第三个阶段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书记的话反映了当时我们大家认识的过程。后来，“两山论”成为浙江发展的一把“金钥匙”，特别是一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开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也打通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如今，绿水青山成为浙江最引以为傲的“特产”与名片，在全国形成了标杆效应。

　　四是扩大浙江开放水平，主动接轨上海、全面融入长三角，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当时浙江的发展叫作“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一是浙江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缺乏，比如人多地少，几乎没有煤和金属矿产资源等，企业生产所需的大量原材料，都要从省外乃至国外进来；二是做出来的产品也要广销海内外。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开放行吗？习书记来了以后，高度重视接轨上海、扩大开放的问题，并专门让我们政研室作了关于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情况的调研。我们会同有关部门跑了很多省，得出一个大致的数字：有400万浙江人在国内各个省、100万浙江人在世界各地经商创业。通过这次调研，习书记提出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反复强调要“北接上海、东迎台资”，还提出了“地瓜经济”论。习书记用地瓜比喻浙江经济，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但它的块茎始终长在根基位置，把外面的营养吸收起来又回到根部，意思是浙江人虽然在外干事创业，但仍然能很好地反哺浙江。习书记的这番话，对统一浙江广大干部的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要素整合、拓展浙江的发展空间，是很有帮助的。“浙商”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叫响的。2004年，习书记还专门给首届浙江商人年度风云人物评选活动致贺信，充分体现出他对浙江开放、对浙商走出去的殷切期望。

　　五是成立浙江省委财经领导小组。财经领导小组这一机构，中央一直是有的，但省里建立这一机构的并不多。2003年4月，浙江成立省委财经领导小组，4月18日习书记主持召开 2003年度省委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之后基本上保持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的频率，以此加强省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而且，在此之前，浙江是在每年中央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召开一次省委全会，把经济工作议题纳入其中，一起召开会议。从2004年底开始，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就单独召开，体现了省委对经济工作看得重、抓得紧，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六是提出“法治浙江”。2005年，习书记给我们出了一个调研题目：浙江如何加强法治建设。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和酝酿，习书记在2006年4月25日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报告中正式提出“法治浙江”的思想，强调一要深刻认识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意义，二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浙江”建设，三要扎实推进建设“法治浙江”的各项工作，四要切实加强“法治浙江”建设的组织领导。那个时候，习书记就把坚持党的领导、党委总揽全局和依法执政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突出重点来抓。其他省从依法治省的角度都建立了领导小组，而且其办公室都是放在司法厅、政法委，甚至放在省人大。我们也提出一个方案，建议把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放在政法委或司法厅。但习书记提出，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放在省委办公厅。我理解，“法治浙江”建设涉及很多方面的工作，放到哪一个部门，协调起来都容易出现扯皮、推诿等现象，放在省委办公厅统一协调，力度大、效率高、最合适。

　　省委建设“法治浙江”工作领导小组的规格在当时省里所有领导小组中是最高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主要负责同志都是小组成员，几个班子里面分管领导以及其他涉及的部门负责人也都参与。当时我已经到省委办公厅工作，习书记对我说：“家玮，你来当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要做两项工作，一是把每年的工作要点、领导小组会议作一个整体谋划，通过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二是每年的工作要点确定下来以后，把重要工作分解下去，落实到各个部门。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定要做好统筹协调、抓好落实。”这项任务光荣而艰巨，我就按照习书记的要求认真负责地做好日常工作，努力推动“法治浙江”建设各项任务的落实。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的领导艺术。

　　潘家玮：我从省委政研室再到省委办公厅工作，确实对习书记的领导艺术有深刻的感受和体会。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沉着冷静，具有很强的战略思维。习书记统筹全局的能力很强，善于从全局角度、战略高度谋划大事。他以“八八战略”和“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总抓手和总要求，对浙江工作进行总体战略布局，充分反映出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意识和战略思维。在浙江经济发展面临转型难题，社会矛盾、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外界和内部的说法、疑惑很多，有的甚至说“浙江模式”已是穷途末路了。习书记非常冷静，在几次会议上都鲜明指出，浙江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根子就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我们就是要不断解决问题，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他分析得很透彻，给大家吃了定心丸。

　　此后，习书记通过“八八战略”打出一套组合拳，强力推进浙江改革进程，推动浙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他还相继提出了“两鸟论”（腾笼换鸟和凤凰涅槃）、“两山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统筹“两种人”（市民和农民）、用好“两个市场”（国际和国内市场）、发挥“两只手”（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等等，每个季度都召开专门的经济形势分析会，及时把握浙江经济发展趋势，不断向正确方向行进。

　　二是高度重视调查研究。2003年省委理论中心组第一次学习，习书记就以调研为题开展讨论，会后出台了关于调查研究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在每一次重大决策部署之前，他都要作大量调查研究。除了自己到各地调研外，还要求各部门有计划、有专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省委常委、副省长每年年初分工主持重点调研课题，有关部门参加，搞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基本上成为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政策文件的重要来源。

　　我们政研室当时也搞了不少调研活动。习书记专门强调，政研室的调研要注重提高“四性”：一是提高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二是提高调查研究内容的针对性，三是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四是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习书记这番话，不仅是对我们政研室的同志们提出要求，对整个调研工作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遇到一些专项问题，他都会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决策以后狠抓落实，而且是一抓到底。贯彻落实过程中，他还会再调研，了解决策在落实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有哪些需要深化完善的地方等等，再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决策的有效落实。

　　比方我刚才讲到的，“八八战略”的提出就是习书记善于调查研究的典型范例。从2002年10月习书记到浙江，到2003年7月10日他完整提出“八八战略”，一共是272天，除去周末和法定休息日以外，一共是187个工作日。这其中，习书记到各地各部门调查研究的时间是61天，占工作日的32.6%，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到2004年初，他的足迹已经遍及浙江的各个县（区、市），有些地方还去了多次。习书记后来提出，当省委书记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当市委书记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县委书记要跑遍所有的村，这不是一句空话，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还有一次，2006年3月，我刚从政研室调到办公厅工作，习书记把省委秘书长、我，还有几个相关同志叫去开会，交代我们在全国两会期间要组织办公厅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主要了解省委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下面有什么反映和建议，落实当中还有什么问题等。我们分明察、暗访两方面人员，每个市一个组，大约五六十人，所有调研费用全部拿回办公厅报销，不准由基层“买单”。这一次调研，我们写了1个总报告、13个分报告，共9万字，习书记看得非常仔细，每份报告上他不仅划出很多重点语句，而且还在空白处作批注。办公厅督查室把这些内容都作了梳理，根据内容类别分解到各个部门去落实。从2006年开始，每年全国两会期间省委办公厅都会组织干部下去调研，一直坚持到现在。

　　三是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习书记很重视群众意见，总是尽最大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这和他在七年知青岁月中与基层百姓培养出的深厚感情有很大关系。2003年，习书记要求建立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先是亲自主持到基层调研，随后省委专门发文件，规定党委政府每年要做10个方面的民生实事。从2004年省两会开始，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每年要办10大民生实事。这10大民生实事，一开始是政府根据调研情况安排的，后来根据征求的群众意见安排，并在次年两会上，省政府要就这10大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向省人代会报告。这个制度也一直坚持到现在，推动了很大一批百姓民生问题的解决。

　　浙江台风灾害多发，习书记来了以后，反复强调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最重要，抗台工作要以“不死人、少伤人”为原则。安排群众转移时，普通老百姓都有故土难离的思想，又舍不得放弃家里的财产，有的老百姓拽着自家的房门，怎么都不肯走。习书记常说，宁愿听老百姓的骂声，也不要听老百姓的哭声，必须尽一切办法做好灾区群众转移工作。这也充分体现了他真正把老百姓放在心上。

　　四是勤奋学习，严于律己。习书记理论功底深厚，知识渊博，书看得很多。他在调研和听汇报时，都非常认真地记笔记，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待办事项和需要他亲自去抓的事情，他都很快记在笔记本上，一项项很清楚。习书记每天都有大量材料要看，但从不敷衍了事，在办公室或回家后工作到凌晨1点是经常性的情况。习书记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亲属要求更严格，他几次在省纪委全会上讲，他在浙江工作，家里任何人都不能到浙江来做生意。他还对我们说，谁自称是他家人，打着他的旗号谋私利，马上去纪委报告。别看他对家人要求非常严格，但待人非常真诚宽厚，很重感情。有一年，他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时的一个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到浙江来找他，习书记专门请他吃饭聊家常，一点也不敷衍。那一次我们也坐在旁边，习书记的诚恳待人、平易近人，让我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

　　2007年，习书记离开浙江去上海工作，浙江的干部都十分不舍。这种不舍，源于大家对他由衷的钦佩和敬仰。他以高超的智慧和高远的谋划，带领浙江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转型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今天，每当看到总书记在中央层面推出一项项改革措施，并且从顶层设计到推进方案一步步抓在实处、干在实处，我们心中都坚信，他一定能够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来源：《[学习时报](http://paper.cntheory.com/html/2021-03/01/nw.D110000xxsb_20210301_1-A3.htm" \t "_blank)》

湖州老干部最美系列

**让鱼儿游得更欢，让渔民腰包更鼓**

—记最美银耀志愿者 沈学能

沈学能,男, 1958年5月出生，198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休前为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高级工程师。

见到沈学能时，他正在电脑前紧张忙碌地准备着下一次“渔民大讲堂”的课件。“闲不下来，真是闲不下来啊”，沈学能打趣地说道。四十年来，他从带领渔民群众改变传统的、落后的养鱼习惯，开展鱼塘“肆改”、标准化鱼塘改造；到积极推广养殖饲料代替冰鲜鱼喂养；再到试验推广跑道养鱼、鱼菜共生、家庭农场等养殖生产模式，使鱼儿游得更欢、鱼塘亩产更高、渔民腰包更鼓，收获了广大养殖户的信赖与支持。

沈学能是土生土长的菱湖人，在他的记忆中，菱湖不仅是“养鱼人”的家园，也是他四十年来挥洒激情、奉献青春的热土。

1977年，为了克服严寒保温、病害防控等种种困难，沈学能与省淡水所水产专家的合作研究，开展非洲鲫鱼越冬技术研究，通过搞科学小实验，发展培育优良品种，终于成功研制了全省首个土法“稀离子发热器”。

与院校专家的合作让沈学能尝到了甜头，四十年来，在他的牵头下，菱湖渔业在省淡水研究所、浙江大学等多个高校院所专家的帮助下有了长足的发展。退休后，他一边继续以菱湖镇渔业协会秘书长的身份组织专家开展农技推广、政策宣讲等活动，另一方面，他计划利用手头资源建立一支由渔业专家组成的老干部服务团队。

沈学能给老干部专家挨个打电话邀请，在他的努力下，一支由6名渔业资深专家组成的“渔都银领”老干部专家工作室正式成立。

工作室成立不到一星期，老干部专家团队便迎来了第一次考验。“学能师傅，鱼塘里有一条鲫鱼一直浮在水面上，看上去病殃殃的，您赶紧过来帮忙看看吧。”这天一早，南浔云豪家庭农场负责人沈晓龙便打电话给沈学能求助。

得知这一情况后，沈学能立即赶到现场，他仔细看了看鲫鱼的外表，发现并无异常，他建议带回工作室进行解剖。并用手机拍摄照片发送到“渔都银领”微信群中。“肌肉呈点状充血，应该是常见的出血病传染性鱼病”“建议按照比例放入一定量的消毒液进行消毒即可”……微信群里的老干部专家们一通“把脉问诊”，很快提出了解决方案。

除了渔业矛盾纠纷，传统渔业的另一大缺陷就是为保证鱼塘含氧量养殖户需要整夜巡塘，常常一宿无眠。沈学能意识到要解决这一痛点问题，必须要推动传统渔业的现代化转型，开启智慧渔业新模式。之后，他带头创建了全市首位乡镇智能水产养殖系统环境监测与视频监控平台。通过4G网络技术，系统精确实现了水质监控,有效解决了养鱼管理的日常问题。

一组数据印证了他的付出，自“渔都银领”老干部专家工作室成立以来，沈学能先后帮助渔民检测水质、病害4000余次，化解矛盾纠纷200余次；组织专家认证、会诊40余次，为430余名养殖户上门提供技术指导；开展渔业养殖技术培训25期，惠及养殖户1500余人。

付出终有回报。通过与中国渔业协会多番对接，沈学能及其团队于2019年7月成功帮助菱湖镇获得了“中国淡水渔都”“中国生态养鱼第一镇”和“中国淡水渔文化第一镇”三块重量级“国字号”招牌，菱湖渔业产业发展也由此迈入新纪元。

“要做好惠农实事，最重要是要帮助农民增收致富”，这是沈学能心中一直牢记的话。